

文化对儿童语言习得的影响

一、儿童语言习得与文化的关系

婴儿呱呱坠地便开始了五彩缤纷的人生历程。他一踏上人生历程就首先要学习语言。儿童第一语言的学习称为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 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称为语言学习(language learning)。儿童习得语言和学习语言, 是心理语言学、心理学和语言教学所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两种学习都同文化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受到文化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这里只谈儿童语言习得同文化的关系。

婴儿出世, 除了在遗传机制上具有发展为人的规定性之外, 其他方面几乎与动物差不多。儿童的发育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由动物向人演化的过程, 或者说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社会化过程中, 首先要学习人类已有的文化, 长成之后再创造新的文化。

在社会化进程中，语言习得起着关键的作用，这是因为：

（一）语言本身就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最优秀的文化，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动物界虽然也有自己的交际系统，能够运用体势、声音、气味等来传递信息，但是这种“动物语言”是难以同人类的语言相提并论的，是有本质差异的。（二）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记录符号，几百万年来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大都保存在人类语言之中。学习语言，不单是掌握一种交际工具，而且也是在学习人类的文化。（三）语言还是社团的标志。不同的语言或方言，不仅是社团内部进行交际的工具，而且也是该社团对内认同的标记和维系的纽带，掌握社团语言或方言，是成为该社团成员的一种重要资格。所以，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学习文化、获取社团资格的过程，是社会化的必由之路。

儿童习得语言有一种先天的能力。除了大脑有严重语言障碍，听力损失严重和发音器官有严重病变畸异的儿童之外，都可以在成人看来是“毫不费力地”学会第一语言，而再聪明的动物都难以实现这一点。

但是，尽管人类有习得语言的先天能力，要真正习得语言还离不开后天的语言环境。人们曾发现了三十多个由野兽抚养的人类孩子，这些“兽孩”都没有人类语言，甚至后来经过精心教习，也难以奏效。当前，关于儿童语言习得的理论很多，但不管是行为主义的模仿说、乔姆斯基的先天能力说，还是皮亚杰的认知说，都承认后天语言环境在儿童语言习得中具有重要作用。模仿说认为，儿童是通过对成人语言的模仿来获得语言的，后天环境中的语言是儿童模仿的蓝本；先天能力说认为，儿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先天的语言获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这种装置通过对后天听到的语言进行能动的分析加工，抽象概括出语言规律，从而习得语言；认知说认为，儿童习得语言是一个不断建

构的过程，这种建构也是以儿童听到的后天语言为基础的。可见，这些学说虽然争论纷然，甚至针锋相对，但都承认没有后天语言环境所提供的语言参与，儿童是难以习得语言的。

后天语言环境，是有文化因素参与、受到各种文化因素制约的，从广义上来看，语言环境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环境。不同的文化社团对于语言的态度，对于儿童习得语言的态度以及对于合格社会成员的看法，都会对儿童习得语言的环境发生各种微妙的影响，影响着儿童的语言习得。加之儿童要习得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团文化的积淀，是社团文化的一种体现、一种记录、一种标志，因此，文化对儿童语言习得也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不同的文化符号、文化观念及文化传统制约着儿童习得语言的方式、重点及速度。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看文化对儿童语言习得的影响。

二、文化符号对儿童语言习得的影响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不同的语言是不同民族或种族的文化的符号，不同方言是某民族不同方言区或社区的文化的符号。在同一语言或方言中不同的语言单位、语言单位的组合方式和使用方式等等，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反映着不同形式的文化积淀。不同语言或方言的习得难度，同一语言或方言中不同语言现象的习得难度及顺序，是不相同或不很相同或很不相同的，这必然影响着儿童习得语言的速度和特点。

比如对于复数表达方式的习得，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有较大的不同，所以习得的速度也有惊人的差异。汉语的复数表达方式比较灵活简单：其一，许多名词单复数可以采用同一形式，其后不必加“们”；其二，人称代词系统中，单数形式+“们”就可以

表示复数，规则一致简明；其三，谓词不需要因单复数而发生形态变化。因此，说汉语的儿童习得复数表达方式较早，一般来说在二岁多至三岁时就已基本掌握。相比而言，英语的复数表达方式就比较复杂，不仅名词要有词形变化，而且谓词也要有词尾变化；变化规则有时不很一致，如代词的单复数词根往往不同，名词的复数有时不加“S”等。因此，说英语的儿童往往六岁才能掌握复数表示法，而且在习得过程中还往往出现过分概括的现象，把不规则的复数名词说成foots、mans、mouses等。在土耳其语中，复数的表示方法更为复杂，以至于说土耳其语的儿童到了十四五岁才能掌握。^① 这比说汉语的儿童晚十一、二年，比说英语的儿童晚八、九年。

据观察，汉族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较少出现语法“错误”。因为汉语属于孤立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不管是构词还是造句，语义都是优先考虑的因素，而语法的制约较为灵活宽松，具有较大的弹性。这种语法特点是汉族儿童语言习得时语法“错误”出现较少的重要原因。然而，说印欧语的儿童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相对而言出现的语法“错误”就比较多。同汉语比较，印欧语最显著的特点是富于形态变化。在构词和造句时，不仅要考虑语义因素，而且在语法上也有严格的要求，数、格、人称、时、体、级等的词形变化比较为复杂，而且有许多不规则形式，这就给儿童的语言习得带来较多的困难。例如说英语的儿童受偏向性类推习得策略的影响，常常把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态规则化，出现comed、hided、breaked、goed、doed等成人语言中所没有的形式。前面提到的关于对复数形式的过分概括也属于这类“错误”。再如，俄语的第四格，阴性名词后加—y，中性名词后加—o，阳性名词中的动物名词后加—a。阳性名词中的非动物名词无词形变化，是一个零形式。但是，说俄语的儿童在两岁左右开始习得名词第四格时，常用—y作为所有第四格的

词缀，把它规则化。汉语与印欧语在语法上的不同特点，使说汉语的儿童和说印欧语的儿童在语言习得中出现的“错误”率上出现较大差异，形成不同的习得特点。

语言类型学研究表明，不同语言中存在着许多各种语言共有的普遍现象，而且也都有各自的特殊现象。著名语言学家雅可布逊（R·Jakobson）在《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这一“经典性著作”中指出，儿童先习得的是全人类语言中共有的音，然后才是他们本族语中所特有的音。^②著名心理语言学家斯洛宾（Slobin）对比了14个主要语系的约40种语言的儿童习得情况，发现了如下规律：

（1）后置的语法形式比前置的语法形式更早习得；

（2）无标记语言成分比有标记语言成分更早习得；

（3）语义成分同语法形式之间越是遵循一一对应原则的越，早习得；

（4）不同屈折形式表示同一语义功能的，儿童倾向于用一种屈折形式代替其他屈折形式，形成过度概括；

（5）语义上前后一致的语法规则习得较早，而且不会有显著的错误。^③

雅氏和斯氏的说法也为后来的许多研究所证实。我们知道，儿童语言习得受制于两个重要因素：（1）认知的复杂程度（cognitive complexity）；（2）语言形式的复杂程度（formal complexity）。而事实上各民族儿童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实际上制约儿童语言习得的主要是语言形式的复杂程度。各种语言的普遍现象和特殊现象的多少不同，特殊现象也各有各的“特殊”；各种语言关于斯洛宾所提及的五个方面的情况也有重大差异，因此使得各种语言（包括方言）以及语言中的各要素的复杂程度有所不同，这样就使得习得不同语言的儿童在习得过程中形成不同的特点，遵循不同的习得方式和习

得顺序，对某一语言现象乃至某种语言在习得的速度上出现或大或小的差异。这就是文化符号对儿童语言习得的影响。

三、语言观念对儿童语言习得的影响

语言观念是指人们对于有关语言的一系列态度和看法。诸如口语与书面的地位，普通话与方言的地位，对本族语和外语的感情，对语言功能的认识，对于应用语言的各种社会准则的看法等等。语言观念是文化观念在语言方面的具体体现，任何一种语言观念都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受制于诸多的文化因素。

《颜氏家训》载：“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④某士大夫同颜之推对待习胡语的态度大相径庭，绝不只是个语言观念的问题，而是表现出对待异族统治者的态度。

美国心理语言学家兰伯特（Wallace E Lambert）曾经用配对变语的试验方法来测验人们的语言感情。加拿大是个多语国家，一部分人讲英语，他们是英语世界的后裔；一部分人讲法语，他们是法语世界的后裔。兰伯特让一个既懂英语又懂法语的人用两种语言朗读同一内容的材料，制成录音放给不同的人听，要求听者根据录音来对朗读者的品格、特征进行评价。当听者是讲英语的人时，他们对用英语朗读的人评价较高，而对用法语朗读的人评价较低。^⑤我们知道，用两种语言朗读的其实是同一个人，朗读的内容也是同一的，而且根据录音能否对一个人的品格、特征作出评价也很难说。表面上看，这是对待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的评价，其实是说英语的人对说法语的人有一种歧视态度。语言感情之中注入了深刻的文化内涵。

语言观念对儿童语言习得常常发生较重要的但往往为人所忽视的影响。有人曾经研究过汉族儿童和撒尼族儿童在习得形容词方面的差异。⑥发现撒尼族儿童很少使用贬义词，如“狡猾、讨厌、笨”等。原因是撒尼族人热情，讲究礼貌，注重团结，自尊心强，因此，他们很少使用贬义词来评价别人，听话人因自尊心强也常常难以接受贬义评价。这种特殊的民族心理形成了他们特殊的对于贬义词的态度，从而影响了儿童对贬义词的习得。哈尼族儿童对于“乖”这个词的习得远晚于汉族儿童。汉族人在传统上不鼓励孩子的创造性，由于受儒家宗法观念的影响，总希望孩子温顺听话，因此，常常用“乖不乖”来评价孩子。而哈尼族人注重孩子的能力和行为，他们表扬孩子不象汉族常用“乖”这个词，而是用“猴”（本事大）、“得”（很好，很行）。由不同的文化观念所形成的不同的语言观念和语言应用习惯，造成了汉族儿童和哈尼族儿童在这些词的习得上的差异。

在对待语言的态度上，汉族人有一个根深蒂固影响至今的传统观念：重视书面语，轻视口语。读书诵经可以明道知理，赋诗作文可以中举进士，汉朝规定，能背9000字的儿童可以当“史”官；唐代科举考试，设有“童子科”，宋代专设“念书童子科”，考读书诵经。因此，历代社会对孩子都特别重视认字、诵经、赋诗作文的教育，而轻视口语教育。这种重视书面语轻视口语的语言观念和教子观念，必然对儿童的语言习得带来很大的影响。古今充满神彩怪环的神童，都是在书面语习得中的佼佼者，而鲜见口语习得中的佼佼者，就是这种影响的典型写照。

然而西方有较早的“说话”传统。在古希腊时代由于民主政治的需要，演讲便受到重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便是专讲演讲术的。在中世纪，演说被列为七艺之一，十八世纪坎普贝尔的《演说学讲义》被许多国家当作课堂说话训练的教材。⑦法国母亲在嫁女儿时常爱说：“我的女儿没有什么嫁妆，可她会一口标

准的法语。”这些都说明西方人比较重视口语训练。这种语言观念使得西方儿童在习得语言时，也把口语作为一个习得重点。比如英语世界最权威的两本词典之一——韦氏英语词典的编纂者韦伯斯特，一降生就同时学习英语、法语、德语和北欧语，很小的时候就能用四种语言流利对话。由于我们同西方对待口语的态度不同，从而导致了我国儿童和西方儿童在语言习得上的一些差异。

四、性别角色对儿童语言习得的影响

所有的人都在人生舞台上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其中以男女性别为据所扮演的性别角色是最为显著的。任何一个文化社会，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不管是原始的还是文明的，不管是母权制的还是父权制的，无不为性别角色提出一系列的社会文化规范，即“男人应该怎么样”“女人应该怎么样”的要求。性别角色的社会文化规范，不仅同男女不同的生理特征以及由此生理特征而推演出来的社会特征相联系，而且也是文化发展演变积淀的产物。前者形成各种文化对性别角色规范的共性，后者导致各种文化对性别角色规范的差异。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不仅要重视共性，而且更要重视差异。

男女性别角色的差异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表现在语言上。社会语言学家在许多语言中都发现了男女语言的差异。比如在美国的一些方言中，女性所发的元音比男性更趋于极端，即高元音舌位比男性更高，低元音舌位比女性更低。在蒙古语的一个方言中，女性使用的元音比男性的更靠前。北京所谓的“女国音”也是性别语言的体现。女性用语比男性文雅，富于情感，而且讲话比男性更注意使用有声望的标准语，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

性别角色必然影响到儿童的语言习得。一方面，父母和社会对于男女儿童的角色希求不同，对男孩和女孩的谈话有不少差异。一般说来，对男孩的谈话较粗放，斥责、威胁的语句较多；而对女孩的谈话较温和，常用商量、开导的语气。例如：③

- a. 你是不是故意跳的？那么高为什么要跳？不怕摔死？
- b. 唉，那不能拿！那妈妈打人的呢！你讲个故事妈妈给你拿好，不好？

a是母亲对男孩的谈话，b是母亲对女孩的谈话，其风格大相径庭。这无疑会对男女儿童的语言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这种谈话语言也是儿童在习得过程中所要学的语言。另一方面，儿童在进行角色认同时，也在语言方面进行认同，这种认同会受到父母和社会的鼓励或抑制。因此性别角色常会对儿童的语言习得发生较大影响。

女孩在语言上比男孩发展快，是性别角色影响儿童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方面。女孩开始讲话比男孩平均早2~4个月，而且这种言语能力的领先一直保持到青春前期。汉族儿童在反复问句和是非问句的习得上存在着较显著的性别差异。据研究，在1.5~2岁时，女孩对反复问句理解的平均水平高出男孩13%以上；而在反复问句和是非问句的发展上，女孩比男孩要提前半岁到一岁。其原因在于女孩比男孩更乐于与人交往，三四岁的女儿几乎要花25%的时间与人交往，这种交往对于语言习得是极有利的。此外，女孩在干一件事之前，往往要先向成人请示，而男孩则不然，因此，女孩在问句习得上呈现出领先趋势。

现代汉语中的“吧”问句是一种疑问程度较低的是非问，这种问句有时根本不表疑问，而是表示一种礼貌的请求、建议或商量。女孩大约在二岁时就开始习得了“吧”问句，而且使用频率很高；而我们跟踪调查的一个男孩，到三岁时才开始习得“吧”问

句。原因就在于“吧”问句较为适应女孩的性别角色，而不太适应男孩的性别角色。

据观察，女孩较多地使用礼貌语言，较多地使用形容词来对人或事物进行感情型评价；而男孩则较少地使用礼貌语言，较多地使用动词来进行祈使或描述行为。这与女性讲求文雅、富于感情，而男性较为粗放、重视行为有直接关系，是性别角色早期分化在儿童语言习得上的表现，初步显示出男孩的阳刚之气和女孩的阴柔之美。

以上情况表明，性别角色对儿童的语言习得有着重要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儿童习得语言的速度和与性别角色关系密切的语言现象。

五、文化环境对儿童语言习得的影响

任何孩子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习得语言的。文化环境是由物质的和精神的、家庭的和社会的诸多因素交叉复合而形成的。这些因素包括家庭成员的文化素质、宗教信仰、生活条件、地区与民族特点、时代背景等等。不同的文化环境对于儿童的语言习得有着一定的影响。

家庭、社会的文化素质以及幼儿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对儿童语言习得的影响很大。在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中，儿童一般只习得方言，而在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中，儿童一般是习得普通话，或方言和普通话同时习得。一般家庭儿童只习得一种语言，而在家庭成员中有专门从事外语教学、研究的人或有懂外语的人时，他们的儿童则往往也同时习得外语。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的儿子一鸣，就是汉语、英语同时习得的。

云南撒尼族生活在山区，文化教育比较落后，部分儿童六岁才能进幼儿园。因此，撒尼族儿童在语言习得的速度上就要比汉

族儿童慢。比如形容词的掌握，撒尼族儿童与汉族儿童相比，其习得水平大致落后一年。^⑨有人在研究儿童使用量词的情况时也发现，同年龄的不同幼儿班级，凡教师比较重视量词教学的幼儿量词就较丰富，且错误较少；反之，则量词掌握少，且运用量词的错误率较高。^⑩

不同的生活环境对儿童语言习得也有影响。比如撒尼族由于生活在山区，撒尼族儿童对于“陡”这个词的掌握一般比汉族城市儿童掌握得早。四川、湖南以爱吃辣椒而闻名，这两个地区的儿童对于“辣”这个词的掌握要比其他地区的儿童早一年至一年半。^⑪因为生活环境不同，儿童对于某些词的意义体验就不同，而且某些词在成人语言中出现的频率也不相同，所以会给儿童的语言习得带来差异，

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于儿童进行早期教育的重视，儿童的心理、智力和语言的发展在不断加快。比如对于“因为”一词的掌握，过去有人研究认为，儿童进入小学时还不能较好掌握。后来有人发现儿童到五六岁时出现了“因为”。^⑫然而现在教育较好的儿童在三四岁时就会使用“因为”。此外，现在幼儿园儿童说话大量使用关联词语的现象，也是为许多家长和幼儿教师所熟悉的事实。随着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对于儿童语言习得的重视，这一趋势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总之，儿童语言习得不仅受制于儿童先天的语言学习能力，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后天文化的影响。重视并认真研究文化因素对儿童语言习得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于儿童语言习得的促进是极有好处的。

注释：

①见桂诗春《心理语言学》第三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②参见伍铁平《雅可布逊：〈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言普遍现象〉》，1981年第

3期《国外语言学》。

- ③参见Dan Slobin: *Psycholinguistics* (Glenview, Illinois: Scott, Foresman & Company, 1979), 2nd Ed. PP. 95—96。
- ④《颜氏家训集解·教子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 ⑤见华莱士·兰伯特《双语现象的社会心理》，载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 ⑥⑨⑩见语言发展研究协作组《幼儿使用形容词的调查研究》，载朱曼殊主编《儿童语言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 ⑦参见张锐、朱家钰《说话训练》第17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⑧两例引自李宇明《试论成人同儿童交际的语言特点》，1987年第6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 ⑩见应厚昌等《四至七岁儿童掌握量词的特点》载朱曼殊主编《儿童语言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 ⑫见李丹主编《儿童发展心理学》第13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与武汉话表“未”同义否定句 相关的社会因素

基本意义相同的一组否定句，叫同义否定句。武汉话里的否定句很有特点。如对“跳了舞？”作出表示“未跳”的回答，不算用反问语调的，武汉人可以有四类表“未”同义否定句供选用：

- A. 冇跳。
- B. 邱怀跳了的！
- C. 跳楼^{e42}！
- D. 跳个鬼！ 或：跳个鬼的舞！

各类还有小类。A类里，“冇”常常单用，可取代“冇”的还有“冇冇、没有、没、miu⁴²”。B类里的“邱怀”，是武汉话里表示乌有公的名词，也说成“邱老怀”；武汉话里同“邱怀”一样表示乌有公的还有“肖怀”以及由它派生出来的“肖家的姆妈”“肖家的婆婆”等。“鬼”也可用于B类。如“肖家的婆婆去了！”“鬼去了！”意思都是“任何人都未去”。C类的构成较为复杂，不易为外地人理解，需要说明。C类否定句是利用与被